

■读与评

# 读马自树《文博赘言》的一些心得体会

李晓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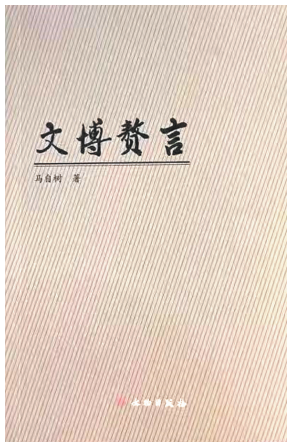
2024年2月9日是中国农历除夕，下午5点多从智能信报箱取回马自树先生著《文博赘言》一书，以急切的心情先逐一阅看了书的目录，眼前一亮，第一感觉是全书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实践性、理论性、时代性强。在以后的日子里，选读了一部分文章，我深深感受到，就全书的价值和意义而言，远不是马自树先生自谦的“文博赘言”而是阐述守正、传承、创新、发展的正言，是见证历史之言，是一部新时代宣传文博工作正能量的优秀著作。

在阅读中，看了马自树先生写的万余言小传式自序与后记，对进一步了解该书著作的价值和意义有很大启发和帮助。马自树先生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到中宣部工作，与文博开始结缘，后到故宫博物院担任领导，具有了文博一线工作实践和经验积累。到国家文物局担任领导十多年，仅有文物考古司未曾分管。我在国家文物局综合财务科时，马自树先生就是分管该司的领导。这些经历，使他兼具文博工作一线工作经验和国家文物主管部门领导工作经验，这是十分珍贵的实践经验，为撰写高质量文博文章奠定了重要基础，加之他深厚的学养和理论功底，与时俱进的信念，促使他撰写了一批又一批优秀文章。在出版该书之前，已出版了《文博从谈》和《文博杂话》两部著作，现又出版《文博赘言》一书。文博工作实践守正创新、与时俱进，成就了马自树先生的系列著作，成绩斐然。《文博赘言》全书分为文博篇、讨论篇、记事纪念篇、历史篇、

杂诗篇和附录，还附有20多幅珍贵照片。全书30余万字，现从已阅读的文章中列举数篇谈些体会。

在“文博篇”有一篇《“让文物活起来”的释义》的文章，提出了七点内涵要义。其中之一是“要深入研究和阐释文物的深刻内涵，并以此滋养观众，使观众有更多‘获得感’”。这一点，我认为就是“让文物活起来”的根本要求，也是前提，是基础。文物是历史文化遗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内涵博大精深，不系统抢救、保护，不深入挖掘价值，不系统研究阐释，就失去了“让文物活起来”的真谛。七点内涵要义的最后一点是“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来扩大文物的活动空间”。我认为这一点就是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多媒体传播手段更多、获得感”。马自树先生的文章，是一份记载公约诞生的重要历史文献。

在“文博篇”中，有一篇《文物工作部分语汇初识》，对“文物工作十六字方针”“处理考古与基建关系的‘两重两利’方针”“大遗址保护”“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单位‘四有’”“不可移动文物修缮原则：不改变原状、修旧如旧”等17条语汇的来龙去脉和内容作了概述。阅读这些语汇，我认为它们是文物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曾承担了2007年度质检公益科研专项项目《文物术语研究》课题。我参加了该课题研究



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是中国参与制定的第一个国际保护文化遗产公约。我曾两次参加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召开的讨论、制定该公约草案的政府间专家委员会会议，在最近做的“百科学术大家”系列访谈中，我谈了当时在政府间专家委员会会议上，中国代表就追索时效问题、善意持有人问题、追索人有权在规定之外采取措施追索等问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在外交大会通过的公约文件中都有不同程度体现。我也参加了外交大会，在中国政府代表马自树在外交大会通过的公约最后文件上签字时，我拍下了签字的珍贵影像（见书后图片7），记录下这一重要历史时刻。马自树先生的文章，是一份记载公约诞生的重要历史文献。

在“文博篇”中，有一篇《文物工作部分语汇初识》，对“文物工作十六字方针”“处理考古与基建关系的‘两重两利’方针”“大遗址保护”“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单位‘四有’”“不可移动文物修缮原则：不改变原状、修旧如旧”等17条语汇的来龙去脉和内容作了概述。阅读这些语汇，我认为它们是文物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曾承担了2007年度质检公益科研专项项目《文物术语研究》课题。我参加了该课题研究

期评审和结题评审。在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方面专家学者参加的终审会上通过了课题结项。但后来未见正式出版。我认为在文物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中，应进一步加强对文物术语的研究和规范。

在“记事纪念篇”中，有一篇《跨国大案——追索英人文物走私案记事》，自1995年至1998年详细记录了追索英人文物走私大案的历程，曲折、复杂，艰苦斗争，事实清楚，内容丰富。这是一次中国运用法律手段，辅之以外交交涉，取得追索3000余件文物顺利回国的重大成果。“记事”是这次追索文物的真实记录，是一份十分重要的、珍贵的历史资料，对研究文物保护史，特别是关于追索文物流失史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但感到遗憾的是，目前文物部门没有一个专门收集、保管、研究、展示中国文物保护史珍贵资料和实物的机构和队伍，与我国是文物保护大国和70余年文物保护取得的重大成就极不相称。李让、赵夏已撰文建议成立国家文物保护史资料馆，几年前我也曾向国家文物局领导提出建议。新时代应有强烈的机遇意识，时不我待，希望早日看到结果。

《文博赘言》

作者：马自树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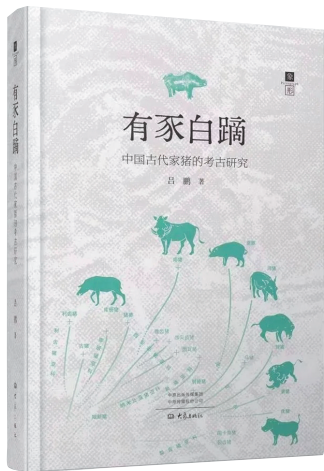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2年11月

■新书共赏

## 历史长河里的相伴相行

### ——读《有豕白蹄：中国古代家猪的考古研究》

王军敏



早在人类诞生之时，动物在地球上生存已久。与人类同行的动物种类繁多，但猪无疑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家猪源于野猪，中国古代先民独立地驯化了野猪，家猪从野猪种群分离出来后，人类针对家猪资源进行了饲养技术的创造和发展，作为资源的猪从饮食、肥料、原料、医药、礼俗等多个方面为人类所用。可以说，家猪的驯化和饲养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创造，它深刻地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吕鹏老师长期从事动物考古的研究。作为一名考古人，他用实际成果传达出了考古人的热忱、严谨与敬业。其最新力作《有豕白蹄：中国古代家猪的考古研究》一书，聚焦于中国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猪骨遗存，应用动物考古研究方法及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探讨中国家猪起源的时间、地点、动因和扩散情况等；家猪的饲养技术与中国古代养猪业相辅相成，技术革新促进了中国古代养猪业的发展，汉代开始中国家猪品种走出国门，对世界猪种改良做出重要贡献；中国古代养猪业的发展与家猪的世俗之用相辅相成，猪浑身是宝，它的每个部位都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此外，猪还承载了丰富的仪式和文化内涵。

为其有用而多产

就世界范围看，哺乳动物大约有5500种、鸟类有10000多种，然而，家养动物的种类却少之又少，譬如：主要家畜不足20种，除马、黄牛、绵羊、山羊、狗之外，还有骆驼、水牛、羊驼等，而主要家禽不足10种，包括鸡、鸭、鹅、鸽等。可见，并不是所有动物都可以被驯化。猪能够被驯化且逐渐成为“六畜”之一，在满足苛刻的驯化条件的基础上，更因其“有用”使然。

首先，猪是人类主要的肉食来源之一。“民以食为天”，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于中国人而言，饮食不仅仅能满足口腹之欲，更是关系人情、民生和礼俗，承载着重要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含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各地饮食与地理、气候、生产、风俗、文化、时代和经济紧密相连，构成了中华大地上丰富多彩的地域，可以说，饮食文化已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而在动物性食物当中，猪的性价比最高。猪是可以移动的肉食库，猪皮、猪肉、猪油、猪血、猪骨还有猪的各种脏器以及骨髓皆为食材。

在中国出土最早家猪遗存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当中，猪骨遗存破碎且数量较多，其死亡年龄结构以达到肉量最多、肉质最好的个体为主。在发展过程中，猪作为肉食源的地位虽有所波动，但在东周至秦汉时期，家猪作为肉食源已经定型。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耕地被大量开垦和开发，猪以其圈养而高产的优点重新回归“天下畜之”的地位。

其次，猪粪积肥的优势非常明显。粪量大、猪圈积肥收集方便；肥性优，不仅能够提供农作物生长必需的养分，而且还能培养地力和改良土壤；速效肥，不需发酵，等等。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因地利关乎农作物生长，传统农业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肥料的来源。在中国古代，有机肥料的来源主要是靠养猪来解决。养猪的目的不仅是为人类提供肉食，而且是通过养猪将农作物的副产品（如稻草、谷糠和麦麸）和生活中所产生的垃圾（如剩菜、剩饭、猪粪甚至是人类等）转化为粪肥，用于肥田和提高粮食产量。

汉代晚期农田施肥已初具形态；东周时期农田施肥开始普及；直至20世纪70年代，我国肥料的投入仍以有机肥（特别是猪粪肥）为主。而近几十年来，随着无机化肥的大量使用，猪粪已经由富有的肥料变成了主要的环境污染源之一，但无可否认的是，猪粪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确实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增加地力的作用。

再次，猪其他部位在人类衣食住行及经济发展方面作用良多。猪皮可以制革，做衣服、充当被褥；猪鬃具有良好的物理性能，中国猪鬃产业曾在二战期间极为兴盛。家猪在生理和结构等诸多方面所有的优势，使其具有重要的医药价值。

技术改良促发展

家猪起源之后，中国古代先民对其进行饲养和管理，并发展出独具中国特色的、代表当时先进水平的家猪饲养技术，推动了古代养猪业的发展。据研究表明，至少在北魏时期，中国家猪的饲养技术已经相当完备且发达。

首先，放养与圈养相结合的管理方式。约束或管理猪的活动范围的方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灵活选择。在驯化初期，农业初起，农作物产量少，野外食物多，猪在外寻食是很有效率的饲养之法，因此，以放养方式为主，此时猪以养生植物为主食。当然，为了防止猪逃脱，人类会对猪施加一些禁

锢手段，比如套上脚绳。商周时期，圈养方式更为普遍。商代晚期的甲骨文中有关养猪的字形“豕”，表明圈养方式的应用（不仅仅是猪，还包括对马、牛、羊等动物的圈养）已经相当普遍地出现于中原地区。圈养的猪不需要外出觅食，保证了猪的食物来源，且可以更加便利地收集猪粪以肥田。秦汉时期，圈养与放养相结合的方式更趋完善和成熟。上厕下圈（猪圈）的建筑形式至晚在战国时期已经形成。圈养与放养相结合的方式延续的时间很长，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国不少农村地区仍存有这种习俗。

其次，阉割与选育相结合的品种改良方式。对猪的阉割技术，是中国古代养猪技术进步的标志之一，是中国古代兽医技术的一项伟大的发明。据研究，中国先民对雄猪进行阉割的习俗可能早到距今6800至56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早期，甲骨文中有关阉割过的猪的专门文字——豕。阉割过的家猪既便于管理，又有益于品种改良，且对猪肉量增长和肉质提升有重要作用。就家猪选育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变化而言，仰韶时期中原地区家猪尺寸偏小，而北方地区家猪尺寸偏大；龙山时期猪种群的地区差异不甚明显；先秦时期西辽河和长江下游地区猪种群的尺寸偏大，可能分别跟地方品种家猪和野猪占有相当大比例有关，而辽东、淮河中游和中原地区猪种群的尺寸较为接近，表明这些地区可能存在较为广泛的家猪品种交流。商代晚期，出现了新的家猪品种——殷墟肿面猪。汉代开始，家猪品种走出国门，对世界猪种改良做出重要贡献。

再次，因地制宜供给饲料的喂饲方式。在中国古代社会，猪是六畜之一，五谷丰登是六畜兴旺的前提条件，猪饲料的来源主要是就地取材的粗饲料。放养时，“春夏草生”都能成为猪的食物；圈养时，猪能将人类剩余物进行二次利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猪的饲料转为含油更高的蛋白质类食物，如大豆和玉米等。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祭祀礼仪是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祭祀及与之相关的礼仪活动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中国考古发现的动物祭祀多为家养动物。家猪早在驯化之初和饲养早期阶段已在仪式活动中发挥作用。

猪是史前时期最常见和最主要的动物牺牲，猪牲频繁出现，概因其相对更容易得到。而在考古发掘中，随葬猪的多少与家猪饲养规模有密切关系。仰韶文化中期以后，猪已成为区分社会等级和人群的标志物，其象征地位和财富的作用越发显著，往往等级较高的墓葬才会随葬更多猪骨。可见，新石器时代人类随葬或埋葬猪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人群在不同时期存在差异，具体内涵可能包括巫术、祭祀、财富、地位、肉食等多种因素。

周代以后，将社稷祭祀纳入国家礼制体系之中，祭祀用牲逐渐固定化，用牲数量与人物身份地位相匹配。例如，唐朝中央设太社太稷，为中祀，祭祀用牲用太牢（牛、羊、猪各1），州、县社稷祭祀为小祀，祭祀用牲用羊和猪。唐代规定祭品与官员等级的对应关系，猪牲在三品和五品官员中以羊和猪组合的少牢方式使用，六品以下官员单独使用猪牲。

此外，猪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比如，猪是中华龙的原型动物之一，猪龙的形象早在距今8000多年前的辽西地区即已出现，主要是借用了猪的头部特征，为猪首蛇身；龙山至夏商时期，方才奠定现在龙的基本形态。因为猪与“朱”、“蹄”与“题”谐音，所以，古代有给牲畜食用熟猪蹄的习俗，意在熟悉考题、朱笔题名。在中国古代汉字中，有“豕”方有家，陈豕于室、合家而祀，这便是“家”的本义，也有学者认为家的本义为猪圈，或有猪圈者为家，无论哪种解释，中国人都将猪和家联系在一起。

《有豕白蹄：中国古代家猪的考古研究》，从动物考古角度讲述了家猪的起源、用途、饲养技术、文化内涵等，而无论哪个方面来说，家猪的起源与发展都与人类活动密不可分。家猪起源阶段，人类对家猪的驯化，一方面因家猪满足人类衣食住行多方面的需求，所以人类有意识地选择猪作为驯化动物之一；另一方面，家猪能够被驯化，也是其主动进入人类社会的选择。家猪发展及地位确定时期，人类在充分利用家猪各部位及其附属资源的同时，主动改进技术并进一步促进家猪品种的改良。可以说，家猪与人类是相伴相行的。

(作者单位：大象出版社)

《有豕白蹄：中国古代家猪的考古研究》

编著：吕鹏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月

## 长江中游史前文明进程的缩影

### ——读《华容车轱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有感

曲新楠 王良智

2023年5月，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华容车轱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下文简称《华容车轱山》）正式发行。该书系统收录了车轱山遗址历次发掘的主要考古成果，是洞庭湖平原东部地区第一部史前考古发掘报告，填补了这一区域史前考古的空白，为研究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格局、聚落形态特征和文明进程提供了一批重要的资料。

车轱山遗址位于湖南省华容县三封寺镇松木桥村，现存面积约2万平方米，遗址北依长江，南滨洞庭，地处两湖平原腹心区域。该遗址发现于1969年，1982、1983年前后两次发掘。2016至2017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对车轱山遗址进行小规模发掘，并全面清点、修复、整理、统计前两次发掘资料，发掘报告即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版。

车轱山遗址虽然规模不大，但延续时间长。从距今6000年前的堆子岭文化，历经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肖家屋脊文化，其年代下限为距今3800年左右，历时约2200年，中间没有缺环和中断。通过进一步分析车轱山遗址文化内涵，并结合近几年华容李家屋场、七星墩等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可以初步归纳该区域的史前文明演进过程。

#### 多元碰撞： 堆子岭文化与大溪文化、油子岭文化三足鼎立

车轱山遗址2016至2017年发掘的第7-10层及开口在这些层位下的遗迹，1983年发掘第6层大部分遗存和第5层少部分遗存，都属于堆子岭文化遗存。常见陶器组合为鼎、豆、钵，有少量白陶和彩陶。大溪文化因素较少，主要见于1982年发掘简报公布的早期遗存，典型器物有宽折沿圈底彩陶釜和曲领彩陶罐。也有少量油子岭文化因素，如TS03W04第7层有一件壶形罐，还有1983年发掘的T4⑥：1陶甗、T4⑥：2石铲（铍）、T4⑤、T5⑤出土的瓶、壶、罐、簋等。总之，车轱山遗址最早阶段遗存以堆子岭文化为主，同时包含少量大溪文化和油子岭文化因素。

距今6000年左右，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格局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澧阳平原和峡江地区所在的西部是大溪文化的势力范围，北部江汉平原分布的是油子岭文化，东南的湘江流域则主要是堆子岭文化的分布区。三种文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交流、碰撞，湘东北地区是三种文化的交汇之处，也是碰撞的中心。

#### 逐步渗透：油子岭文化全面渗透到 湘东北地区澧阳平原

这点在车轱山遗址表现得尤为明显。该遗址共有200多座油子岭文化墓葬。多数墓葬缺失层位关系，无法提供具体层位依据，但若干随葬陶器具有鲜明的油子岭文化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车轱山遗址只发现油子岭文化时期的墓葬，而不见油子岭文化时期的地层和其他遗迹。因此我们大胆推测，车轱山遗址目前归入堆子岭文化的部分遗存很可能是油子岭文化人群使用的，这部分人群是外来的族群，他们在生活上融入了当地，使用本地生产的陶器，但是在葬俗方面坚持自己固有的传统，使用小型明器随葬。

油子岭文化作为稍晚的、外来的文化因素，从江汉平原扩展到湘东北地区，一方面在生活上适应本地堆子岭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在葬俗上带来了北方新的文化因素。新旧传统交锋的结果，是新的文化因素占据上风，逐步完成文化融合。

#### 融合统一：屈家岭文化时期， 长江中游真正实现文化上的统一

车轱山遗址此时居址和墓葬出土遗物面貌上趋于一致，典型器物组合是弦纹高领罐、双腹豆、双腹碗、圈足杯和斜腹杯。也有少量壶、瓶类器，这延续了油子岭文化的因素。车轱山遗址中豆和壶的形式多样，种类丰富，特征鲜明。如豆除了双腹豆之外，还有折壁浅盘豆、内折沿敛口豆、外折沿盘形豆、豆柄或圈足多装饰圆形、椭圆形、三角形或月牙形组成组镂空。壶有大小、大口、细颈、粗颈、圆鼓腹、扁腹、折腹、平底、圈足等多种不同形态。这些特征与华东平原地区的屈家岭类型有差异，而与澧阳平原和汉西地区相似，应当归属为屈家岭文化划城岗类型。

此时长江中游地区文化面貌总体趋于统一，但不同地

区各有特色。社会内部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发展力，使得屈家岭文化北上逐鹿中原，东进渗透到江淮下游，向西深入到峡江和沅水中上游的山区，分布范围广阔。屈家岭文化时期是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鼎盛时期。

#### 守正创新：石家河文化和肖家屋脊文化 时期，湘东北地区出现新的地方类型

前一个阶段车轱山遗址与洞庭湖周边的其他遗址同属于一个地方类型，但到了石家河文化时期，这个区域独立成为一个单独的地方类型——石家河文化车轱山类型。这个类型流行足面饰凹槽或凸棱或刻划纹的宽扁鼎足、夹砂红褐陶厚胎的大口尊或缸、宽折沿绳纹圈底釜等。

石家河文化时期车轱山遗址诸多文化面貌，尤其是陶器特征体现出守正创新的特点。既延续本地堆子岭文化以来的传统，又表现出各种创新。如宽扁鼎足足面上，发展出刻划短浅槽的“麻面”、凸棱、凹槽等纹饰。夹砂陶缸自大溪、堆子岭文化时期就已出现，到石家河文化时期，除了数量增多，形态也更加多样，有直口直腹、折沿直腹、圈底、平底等多种形态。

报告把车轱山遗址肖家屋脊文化时期的遗存暂时归入孙家岗类型存在不同。车轱山遗址出土较多夹砂红陶管状筒形器，仅在相邻的七星墩遗址有所发现，而不见于同时期其他遗址。七星墩遗址还发现铜矿石、类型多样的玉器等一批新的文化因素，代表肖家屋脊文化时期的文化创新。

总之，车轱山遗址各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是长江中游史前文明进程的缩影。距今6000年左右，长江中游呈现三足鼎立的格局，大溪文化、油子岭文化、堆子岭文化不断交流、碰撞、融合。距今5500年左右，来自江汉平原的油子岭文化，成为三方角逐的胜出者，初步完成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整合。距今5000年左右的屈家岭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出现文化一统的局面，其内部虽有若干地方文化类型，但似乎通过某种方式组织成为一个整体，并且不断向北向东扩张。距今4500年左右，长江中游内部地方类型分化更加明显。此时的石家河文化内部凝聚力减弱，对外也无力扩张，其对外影响力明显不如屈家岭文化。距今4000年左右的肖家屋脊文化继续创新，发展出以玉人像、玉蝉为典型代表的肖家屋脊玉文化系统，并进而影响中原、北方和东方的诸文化，成为华夏文明整体的一部分。

《华容车轱山》的出版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车轱山遗址是湖南最早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并据此提出石家河文化“车轱山类型”，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车轱山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和近几年在华容七星墩遗址的考古工作，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车轱山类型的内涵，有助于重新认识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内部的文化共性和差异。

其次，发掘报告的公布有助于重新认识堆子岭文化、大溪文化、油子岭文化的分布边界。大溪文化和堆子岭文化的交界应当就在华容车轱山和刘卜台两个遗址之间。车轱山、李家屋场遗址以南目前尚未发现油子岭文化遗址，因此可以确定华容地区是油子岭文化的南部边界。

最后，报告公布的资料是开展长江中游史前文化因素研究的重要材料，有助于重新认识堆子岭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的内涵。四座形制独特的肖家屋脊文化陶甗，在湖南属于首次发现，是研究该文化手工业专门化的重要实物参考。

此外，报告也有一些小的瑕疵。表一四、表二〇夹砂陶和夹炭陶的分列错排；图四九三~图四九七各层遗迹分布图中的部分遗迹线条未闭合；编者对部分堆积单元的年代和文化属性判断值得商榷，如H39出土矮领广肩罐和弦断篮纹陶片，应属于肖家屋脊文化遗存，但表五一将其归入石家河文化遗迹。

尽管存在一些美中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华容车轱山》对研究长江中游地区距今6000年以来的文化格局和文化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是长江中游尤其是湖南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作者单位：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华容车轱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全三册

编著：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利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5月